

漓江年选 品质阅读 恒久珍藏

2016 中国年度随笔

徐南铁 选编

石鸿《汪曾祺给我的五封信》

王能宪《袁行霈教授的诗意人生》

李新宇《袁世凯与蔡锷》

何英《莫言小说：感觉之外皆游戏》

崔济哲《烟袋斜街上的斜门歪店》

庄伟杰《文学能给人带来什么》

陈家琪《让我们分享阿伦特的爱》

浦歌《普鲁斯特与我》

郑荣来《我吸到的是第一口空气，是硝烟》

漓江出版社



2016中国年度随笔

徐南铁 选编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6中国年度随笔 / 徐南铁主编.

—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7.2

ISBN 978-7-5407-7527-8

I. ①2… II. ①徐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29622号

2016 ZHONGGUO NIANDU SUIBI

2016中国年度随笔

选编者: 徐南铁

责任编辑: 胡子博 谢青芸

书籍设计: 石绍康

责任监印: 杨东

出版人: 刘迪才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2

网址: <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10-85893190

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西大街 邮政编码: 065300]

开本: 710mm×960mm 1/16

印张: 15.5 字数: 258千字

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 0316-8836866]

人生

- | | |
|-------------------------------|-----|
| 003 / 汪曾祺给我的五封信 | 石 湾 |
| 010 / 一代名伶的生活写真——读荀慧生《小留香馆日记》 | 傅 谨 |
| 017 / 钟叔河先生 | 秦 颖 |
| 025 / 我师钟泰 | 李吉奎 |
| 030 / 袁行霈教授的诗意人生 | 王能宪 |
| 037 / 朱熹的建阳情结 | 曾纪鑫 |
| 044 / 袁世凯与蔡锷 | 李新宇 |
| 049 / 静看浮云杂水声 | 徐南铁 |
| 056 / 自梳女，即将消逝的故事 | 莲 子 |

世事

- | | |
|-----------------------------------|-----|
| 063 / 历史研究无“误区” | 方志远 |
| 070 / 关于“九头鸟性格”与湖北文化 | 樊 星 |
| 078 / 不在场的在场：早已消失但总被人念念不忘的两棵枣树的故事 | 钱振文 |
| 083 / 莫言小说：感觉之外皆游戏 | 何 英 |
| 090 / “墓门深更阻侯门”析证 | 刘斯奋 |
| 095 / 烟袋斜街上的斜门歪店 | 崔济哲 |
| 100 / 零落成泥，其香如故——《白色花》出版轶事 | 若 琴 |
| 107 / 《超脱》：文明是心灵的毒药？ | 谢宗玉 |
| 114 / 怀旧的美国人 | 韩 晗 |
| 120 / 商政文化与子贡之间 | 单 纯 |
| 126 / 腹诽如何光大？ | 安立志 |
| 130 / 文学能给人带来什么 | 庄伟杰 |

135 / 民心可恃：大清政局中的一张牌	商昌宝
141 / 皇上之玺与平民之印	毛 翰

情 怀

147 / 让我们分享阿伦特的爱	陈家琪
154 / 遥想当年读路遥	赵 勇
161 / 我去地坛，只为能与他相遇	杨海蒂
169 / 夺志	陈传席
174 / 爱猫札记	黄 荭
182 / 沐浴精神的日出	王雪瑛
189 / 普鲁斯特与我	浦 歌
192 / 北戴河：地域文化之启示	江 冰
195 / 阅读·慢读·重读·细读	周 实
200 / 面向生命的阅读	李凤亮
206 / 小说地理的言说	黑 丰
211 / 书话三章	徐春平
217 / 绿野的风	李明华
223 / 最后一个历史轮回	任 蒙
232 / 我吸到的第一口空气是硝烟	郑荣来
235 / 长跑，让人类慢下来	吴听骐

241 / 跋

) 人生

汪曾祺给我的五封信

石 湾

日前，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她自报家门：“我是汪曾祺的女儿——汪朝，正在编我父亲的全集。前些天碰到你们作家出版社的萌娘，谈起此事，说她手头还存有我父亲给她的信件。她提供给了我，真还挺有意味。我想你手上也会有我父亲给你的信吧？麻烦你也找一下好吗？”我一想，明年该是曾祺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了，能出他的全集，当然是件好事，便答应汪朝：“我马上就找！”曾祺先生1997年5月16日逝世之后，我搬了一次家，第二次装修也已过了十年，书房里堆积的资料杂乱无章，好不容易才找出两封他给我的信，好在我电脑中还存有他三封信的电子文档。这样，他就至少给我写过五封信。

我一边找信，就一边想起与曾祺先生结交的往事。“文革”后期，我从干校抽调回京，分配到筹办中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1975年秋，兼任艺研院一把手的文化部副部长袁水拍出任《人民文学》主编，从艺研院挑选了几个人去当编辑。我找到他，恳求他把我也带走。未料他说：“你将来还是搞创作吧！我记着你的事，有合适的机会再给你安排。”就这样，到了1975年冬，我就被借调到了北京京剧团创作组。当时北京京剧团是所谓的“样板团”，采取半军事化管理，全团人马都在剧团吃住。巧的是，我与曾祺先生的创作间兼卧室是门对门，直到1978年春我回艺研院，朝夕相处近两年半时间。尽管他与我及杨毓珉、吴祖光分别合作的两个剧本（一人执笔写三场戏）都先后报废了，但作为晚辈，我还是有幸向他学到了许多东西，受用至今。

离开京剧团两年后，我是在1980年6月24日开幕的北京市第四次文代会上见到曾祺先生的。我在这次找信时意外地发现我还保存着一份《北京市第四次文代会代表分组名单》，其中文学界代表162人。如今被人称作“文学巨擘”的汪曾祺却不在此列。他的名字列在戏剧界代表的最后一组。记得那天他一见到我，就很惊异地问：“你怎么来啦？”因在搞完揭批“四人帮”的“清查”运动之后，北京京剧团就回归北京市，不属文化部管辖了。我告诉他，我已调离艺研院，到即将复刊的《新观察》杂志社工作了，是应邀作为驻会记者来采访和组稿的。我知道，在“清

查”运动中，他因“文革”期间在天安门城楼上亮过一次相而迟迟过不了“说清楚”关，所以直到出席这次市文代会，仍像经霜打过的花木，蔫蔫的，不像其他代表那般兴高采烈。我知道他师从沈从文，年轻时曾写过不少小说、散文、诗歌，就问他为什么也不挪挪窝？他说，都已年满花甲，就在京剧团离休算啦！我问他手上有短篇小说没有？《新观察》7月10日复刊，想在复刊号上发一篇小说，尚未有着落。他答，手头倒是有篇小说，好不敢说，但绝不是“大路货”。有家杂志不敢发，你拿回去试试你们主编的胆量！

这篇小说叫《黄油烙饼》，是林斤澜帮把它投给一家杂志的，退了回来，依旧在林斤澜手上。正好林斤澜也是大会代表，他当即去取来交给了我，说：“你可是新时期第一个来向我约稿的编辑呵！”

《新观察》复刊前夕，编辑部也就五六个人，为了确保复刊号一炮打响，几乎所有组来的稿件都要在编辑部传阅一遍。文艺组组长费枝、编辑部主任张凤珠，副主编杨犁读过《黄油烙饼》后，都说这小说写得地道、老到，有滋味儿。认为与他“文革”前写的《羊舍的夜晚》一脉相承，不愧为小说老手。然而，送到主编戈扬手里，却险些给“毙”了。她把稿子交还给我：“让汪曾祺改一改，调子总还是高一点好嘛！”其实我心里明白，这就意味着让我退稿。这下我作难了。因为不只是我与曾祺先生共过事，也曾错划为右派的杨犁与他在西南联大还有同窗之谊呢！所以我们最终还是集体说服了戈扬。但《黄油烙饼》错过了复刊号，延至第二期才发表。而戈扬作为主编，顽强地表现出了她的态度，愣是把这篇小说排在了末条，也没有上要目（那时《新观察》每期都在《人民日报》登要目广告）。所幸的是，《黄油烙饼》在文坛赢得了普遍好评，并收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年选。

在我写信告诉曾祺先生《黄油烙饼》将在第二期上刊出后，他立即就给我寄来了新作《果园杂记》，并附一短简：

寄上散文一组，请阅后转交领导审处。有人说这是散文诗，我看就叫散文吧。此稿字数不多，但我未留底稿，如不用，望能破格退还。

《果园杂记》经领导审阅后，只同意用其中的两章。我立即将此意见写信告诉

了他。他于8月28日回信说：

散文，你们领导拟选用两章，我估计是《波尔多液》和《葡萄的来历》。我拟同意。但只此两章，似乎“撑不起来”。——也可以吧。我自己倒是比较中意《涂白》，因为生活确实曾改变了我的审美理念。但谁读了也不怎么欣赏。那么，只好“归卧碧山丘了”。稿一时排不上，本是意中事。我一时无处可送，先存在你们那里吧。

他的《涂白》，我倒是很欣赏的。经过力争，他的这组《果园杂记》，在第五期上刊出时，就以《涂白》打头，外加《粉蝶》和《波尔多液》，共选用了三章。余下的几章我没留存，及时奉还给了他。但后来收入他的新时期的第一个散文集《蒲桥集》的《果园杂记》，却依然只有《涂白》、《粉蝶》和《波尔多液》。这就使我想到了为什么他要说“我一时无处可送”这样不免凄凉的话了。

1980年夏天，确实是汪曾祺正处于稿子“一时无处可送”的苦恼期。那时，他的小说《异秉》，托林斤澜寄给了《雨花》副主编叶至诚。叶至诚看完后很兴奋，就拿给当年“探求者”的“右派”弟兄方之、高晓声和陆文夫看。他们仨轮流看完后大为赞赏，一致认为如此深厚纯朴、毫不装腔作势的作品实在久违。同时也觉得奇怪，这样好的作品为什么不在北京的那几家大刊物上发表，而要寄到江苏来呢？叶至诚这时才透露，《异秉》是在北京的两家大刊物吃了闭门羹后，才托林斤澜向《雨花》求救的。于是，他们就去鼓动主编顾尔鐔，顾尔鐔二话不说就拍板放行。不过，发出来已是《雨花》1981年第一期了。

就在1980年8月，曾祺先生以自己的初恋故事，写了篇自娱的小说《受戒》。想到这篇小说旨在赞颂被压抑而待解放的人性，不会有刊物敢发表，他就让几个朋友传阅，聊作消遣。不承想杨毓珉看过之后，在北京市文化局召开的创作座谈会上，把《受戒》作为一种试图突破写作禁区的新动向在会上作了通报。主持《北京文学》的李清泉闻讯后，立即赶到汪处要来了《受戒》原稿，并违反编辑部的工作程序，由他直接签发，免得横生枝节。就这样，《受戒》破例在《北京文学》10月号上发表，成了传诵一时的当代名篇。按例说，《受戒》是应该获得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但因饱受争议而终成遗珠之憾。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他

的《大淖纪事》作为一种补偿，获得了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由此，曾祺先生迎来创作上的又一个青春期，一发而不可收。

此时，我为曾祺先生的创作实绩终于得到官方认可，并开始确立他在文坛应有的地位而感到高兴，但我知道他毕竟年逾花甲，应付门庭若市的约稿编辑准够老夫子呛了，就有意与他拉开距离，不去向他逼稿，免得增加他的负荷。然而，他并没有忘了我。1982年5月18日，他主动给我寄来了新作《旅途杂记》，并附信写道：

久不见，你好！

《新观察》一直给我寄杂志，我长期未给杂志写稿，很不过意。我4月初由陕西到四川旅游了四十天，回来准备写点游记。已写出四篇，寄上请你们看看。如有可用，请酌用。不合用，尚祈退我，以搪别处文债。这四篇都有得罪人处，因旅途中有所感触，未能除尽锋芒。这些，也请你们斟酌。

《旅途杂记》中有篇《兵马俑的个性》，他这样写道：“塑像总是要有个性的。即便是塑造兵马俑，不需要、不要求个性，但造俑者还是自觉、不自觉地，多多少少地赋予他们一些个性。因此他塑造的是人，人总是有个性。”曾祺先生本人，就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作家，只是好些人只看到了他平和、优雅、淡泊的所谓“道家风范”，而忽视了他亦多有愤世嫉俗的一面。也可以说，虽经历了像1957年那样的沉重打击，却总也“未能除尽锋芒”。而带有点锋芒的文章，正合《新观察》的胃口，于是，《旅途杂记》就顺利地于1982年第十四期上全文刊出了。

1984年8月，我调离《新观察》，到作家出版社参与《中国作家》的创刊。1985年4月28日，曾祺先生给我写来了一封信。这封信较长，主要说了三件事。第一件是：“我在《新观察》发表过两篇小文，《果园杂记》和《旅途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约我编一本散文集，我想把这两篇收进去，但刊此两文的杂志我已丢了，你能不能想法帮我找到这两期《新观察》？”我当即给他寄去了《果园杂记》和《旅途杂记》的复印件。第二件是：“前寄‘拟故事’两篇给贺新创，不知收到没有，看了没有，便中代为一问。”“拟故事”两篇，近似《聊斋志异》，一篇叫《螺蛳姑娘》，另一篇叫《仓老鼠和鹰借粮》。贺新创时任《中国作家》编辑部主任，我向他询问此稿时，正好他要出差，主编冯牧、副主编张凤珠决定由我代班，统筹第

四期的发稿工作。这样，我就当了《拟故事两篇》的责编，并安排在短篇小说一栏的头条位置刊出。第三件是：

你（手札中笔误为“我”）曾建议我把写过的诗拿到《中国作家》发表，我的诗稿早已不知去向，现在想也想不全了。那几首诗也没有多大意思，里面还提到“越境的熊”，于中苏邦交不利，不宜发表。

你最近写什么？写诗还是写报告文学？

还在北京京剧团创作组时，有天我收到载有我几首小诗的《解放军文艺》样刊，刊中还夹有诗人李瑛（时任《解放军文艺》诗歌散文组组长）给我的一封信。我拆信时曾祺先生正好坐在我身旁，他顺手饶有兴趣地看了我的诗和李瑛的信，笑道：“李瑛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说起来和我还是校友哩！我前两年去内蒙古草原深入生活时写过一组新诗，说不定《解放军文艺》也可以用。”我随即去了他的房间，请他找出他的那组诗给我看。他的记忆力是惊人的。我刚接过他的诗稿，他就说，你先别看，也许我还背得起来。结果，他果真一字不差地把这几首诗背诵了出来。这组有关内蒙古草原和鄂伦春族风情的新诗，风格清新明快，朗朗上口，汲取了边疆少数民族民歌的营养，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当时就说：“挺好、挺好！就给李瑛寄去吧！”他迟疑了一下，说：“我和李瑛还是在北平临解放的时候在校园里见过（当时他夫人施松卿在北大任教，他闲居在燕园），但后来从未打过交道，贸然投一组诗去，不怎么好吧？”他随手把诗稿塞进抽屉，作罢了。1984年底，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在京西宾馆召开，我作为驻会记者，到他所住的房间拜访，希望他支持一下即将创刊的大型刊物《中国作家》。他笑道：“四年前，在北京市第四次文代会上，除了你，没有一家文学报刊向我约稿。这一次，我一来报到，就被各路记者、编辑围追堵截，我手头哪还有存稿呀？我都想逃会，躲起来了。”我说：“旧作也可以。就把你以前你写草原的那组诗给我吧！小说家的诗一旦发表，说不定更引人注目。”他回答：“也不知塞哪里了，让我回家找找再说吧。”接着，他问我最近写诗没有？我说，临离开京剧团时，你嘱我今后如果还写诗的话，得“变法”。这几年“朦胧诗”崛起，我自觉跟不上了，诗写得很少了。到《新观察》当记者后，写了有关史铁生、陈丹青、谷建芬等作家、艺术家的报告

文学。因此，他在给我的这封信中，还关心地问：“你最近写什么？写诗还是写报告文学？”

1985年秋，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从维熙出任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将我调离《中国作家》编辑部，担任作家出版社刚组建的小说编辑室主任。当时，我策划了一套“文学新星丛书”，专为青年作家出第一部小说集。列入这套丛书第一辑的五名作者是：阿城、王兆军、莫言、刘索拉和何立伟。我刚将选题确定下来，湖南文艺出版社的蒋子丹来访，当她得知我在编选“文学新星丛书”时，显得很兴奋，大加赞赏。并说，何立伟的小说集已列入湖南文艺出版社的选题计划，她就是责编。何立伟是她很好的朋友，为朋友考虑，也为文学湘军的整体利益着想，何立伟的第一个集子当然是由作家出版社推出更好，于是她便慷慨地把这个选题让给了我社。我说，这套丛书的每个集子，都得请一位有影响的作家或评论家写一篇序，你看请谁为何立伟作序合适？她告诉我，前不久，她和何立伟一起来京出席《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的部分省市青年作家座谈会，曾去拜访汪曾祺。汪说他看过何立伟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白色鸟》，觉得很新鲜。还认为何很有才华，是个有自己特点的作家。不如就请他作序。我们就这样谈定了。蒋子丹是个很讲义气的朋友，她自告奋勇地把这件事包揽了下来。

11月10日，我收到了汪曾祺为《小城无故事》写的序和他11月8日给我的信：

何立伟要我为他的小说集写序。上星期写的。为天津《文学自由谈》一编辑“抢”去，今天才将原稿及复印件寄来。兹将原稿寄上，看可用否。此序须得立伟同意后方可发稿。我已写信寄立伟，他如同意，可直接写信给你，或给我。

你几时调作家出版社了？相（手札误写成“想”）当好。

曾祺先生在《小城无故事》的序中提到，他在见到何立伟时，曾说何的小说与废名有某些相似处，而何却说此前并没有读过废名的小说。但何后来写信给他说：“我回来后找到他（废名）的书细细读，发觉我与他有很多内在的东西颇接近，便极喜欢。”于是，汪曾祺感到，“这是很耐人深思的。正如废名，有人告诉他，他的小说与英国女作家弗金尼·沃尔芙很相似，废名说：‘我没有看过她的小说。’后来

找到了弗金尼·沃尔芙的小说来看了，说：‘果然很相似。’一个作家，没有读过另一个作家的作品，却彼此相似，这是很奇怪的。”因此，他写道：“我的这篇序恐怕将写成一篇何立伟、废名异同论，这真是始料所不及。”他在序中说，废名是开一代文学风气的作家，沈从文、何其芳都曾受过废名的影响，而何立伟与废名的相似处是哀愁。令他高兴的是，“何立伟在小说里写了希望”，“对立伟的这种变化，有人有不同意见，但我认为是好的”。他还对何立伟“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重意境、重感觉很是欣赏：“与其说他用写诗的方法写小说，不如说他用小说的形式写诗。”

看过曾祺先生长达 4500 字的序后，何立伟复信给我：“汪老的序，写得极好，是难得的文字。序写出这种温暖来，怕也是不多见的。”还说：“汪老的序，原本是《人民文学》拟发，不想叫天津《文学自由谈》拿去了，真有点可惜。汪老的文章，有一种非常难得的文体美，有一种谁也没有的文气。您遇着他，代我向他致礼。”

立伟说得极是，这样美的序文，非常难得。也难怪曾祺先生刚一写得，就“为天津《文学自由谈》一编辑‘抢’去”了。看，他在这里用的是一个十分传神的“抢”字！距他对我说稿子“一时无处可送”，仅过去五年时间，他在文坛的地位和声望真可谓今非昔比了。而这五年，恰好是新时期文学最辉煌的“黄金时代”，令人难以忘怀！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6 年 9 月 5 日）

一代名伶的生活写真

——读荀慧生《小留香馆日记》

傅 谨

荀慧生（1900—1968）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之一，他和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并称京剧“四大名旦”，足见其艺术成就和影响。荀慧生具有开创性和魅力独特的“荀派”表演艺术，为他在京剧史上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地位，他的传人遍布全国各地，无论是他对京剧传统剧目风格感极强的演绎，还是他自己新创的带有浓厚荀派色彩的剧目，都依然在到处上演。荀慧生的一生是作为京剧表演艺术家的一生，然而，荀慧生还给我们留下了另一份弥足珍贵的财富，那就是他的日记。他斋名为小留香馆，故日记题名为《小留香馆日记》。

一

很难想象，出生在贫寒家庭，从小就被卖到梆子戏班里学戏且一辈子以演戏为生的荀慧生，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记日记，且持续数十年而不辍。从1925年到1966年的四十多年里，《小留香馆日记》累积了多达44本（一说45本）。更令人惊奇的是，这批日记历经劫难，在社会剧烈动荡和政权几度更迭的数十年里得以保持全貌。“文化大革命”中荀慧生受到冲击，包括日记在内的大量财物均于抄家时被掳走，“文革”结束后家产被发还，珠宝失落不少，这批日记居然完璧归赵。悲剧却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发生，荀慧生的《小留香馆日记》没有毁于战火和乱离，甚至都没有毁在红卫兵手里，却在荀家其后的析产过程中失落了大部分，至今不知所终，令人扼腕叹息。现在我们找到的，只是残存的6册，其中又包括两部分，一为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一为40年代，中间有多年的间断。不过，这6册日记记录的恰好是荀慧生艺术上最辉煌的年代，前一阶段，恰逢他从一位初获声名的演员成长为名家的重要转折点；后一阶段，更是他人生的顶点，这是他一生中享誉最盛的时期。越是在这样的时期，他所遭遇的各类纷扰越多。因为无从得见全璧，我们很难武断地判定其他部分是更精彩抑或较乏味，但仅从这一部分看，这部由和宝堂等人悉心整理的《小留香馆日记》已经堪称一部奇书。它所具备的独特且

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不仅仅在文献层面和艺术层面，更在社会学方面。说它是民国年间伶人生活的一部别样的百科全书，恐怕也不为过。

我有幸在日记正式出版之前，就先于普通读者看到它的原文，心情十分复杂。我想我不能说“先睹为快”，用“震惊”都不足以描述我的感受。这里所说的“震惊”，首先是震惊于日记的主人居然将他的真实生活内容如此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其次，这些未经粉饰的内容，和我们以往所知的荀慧生的形象，实有太大反差。仅就这6册日记而言，荀慧生当年的生活状况，完全超出了我此前对这位名伶生活的想象与理解的极限。我不知道当这部日记面世之后不久，是不是就将有人依据这些可靠的一手资料，为荀慧生写一部更接近人物本真面貌的传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些曾经给荀慧生写过传记的作者们，面对这些日记大约是会有些郁闷，因为通过这些日记，我们突然发现，坊间任何一部有关荀慧生的人物传记或其他记录性文字，都离真相太远。

我相信让荀慧生日记以这种近乎本真的方式面世，更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二

当我们面对《小留香馆日记》的原文时，才能切身体会到，长期以来我们对名伶的日常生活样貌并无多少了解。无论是在民国年间还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各类报刊上有关他们的诸多报道与评论，几乎从未真正揭示出他们的生活真相。坊间偶尔也有以伶人为主角的小说问世，其中毕竟夹杂或多或少的虚构成分，一般读者也不会真把这类小说当信史读；至于各类名伶传记，撇开为传主讳言的成分，作者纵算和伶人们再接近，也不可能完全了解他们的私生活和真实的情感世界，更难以来奢望其切入如此深的生活细部和情感角落。现在我们拥有了荀慧生的《小留香馆日记》，总算有机会获得了一个记述现代社会中京剧名伶日常生活最有价值也最可信的文本。

在荀慧生的日记里，我们看到他的艺术与人生，同时也看到当时的社会百态。荀慧生以演戏为生，在通常情况下他生活在以表演为中心的天地里，社会上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只要对他的演艺生涯没有形成直接影响，大致不会引起他多少关注。但在这部日记里看到一个例外，那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占东三省的

“九一八事变”。《小留香馆日记》里极为罕见地，完整摘抄了当天北京《晨报》的标题新闻，其震惊与愤懑之情力透纸背。他这样强烈的反应似乎出于本能，因为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国难”这个词就频频出现在日记里，不仅充分展示了这场变故对中华民族的巨大冲击，通过伶人们的相互交谈，也可以看到这场变故是如此强烈地影响了包括荀慧生在内的普通国民。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个词出现的场合与内容，更渐次发生种种微妙的变化。其中固然有各界人士积极组织和参与的救亡活动，有主人公参加各类义务演出的记录，但是，透过荀慧生的记载，我们还看到“国难”被不同人用不同方式消费，因而衍化出林林总总的众生相。其中不乏打着“爱国”旗号的离谱的表演，他们对荀慧生以及他的同行，以及社会各界造成的困扰，实不能全然无视。荀慧生似有先见之明地洞察了这样的结果，他这6册日记所涉的时间段，中国社会的动荡与变化并不少见，却唯有“九一八事变”在日记里留下浓重的笔痕，恐怕并非偶然。

在这部分残存的日记里，恰好记录了现代京剧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有关荀慧生创作演出的许多事实，更可以从中得到最为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的印证。比如1931年杜家祠堂落成的盛会，尽管当年的《梨园公报》印有特刊，但直接参与表演的当事者的记录，这却是独一份。且正因日记有出自主人公的独特视角，一些有趣的细节，是从未在其他记录中看到过的。比如第一天他的《鸿鸾禧》是和姜妙香合演的，与通常史料所载有异，但日记无疑更加可靠。还有，我们看到，为了这场演出，不仅主人杜月笙接送招待的礼数十分周到，道上的朋友们也无不倾力相助。日记里写道，头天戏毕之后，“张师以自卧之床相让，而自睡于门口床上”，实不失为一桩美谈——这里所说的“张师”，就是海上与杜月笙、黄金荣差不多齐名的闻人张啸林。荀慧生曾经很正式地拜在张啸林门下，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在日记里言必称“张师”，而且看来，张也确实很眷顾他。

当然，荀慧生也记下了他“与小云、兰芳、艳秋合演《四五花洞》”这场难得一见的演出，若非杜家天大的面子，要让他们四人合演一折戏，简直是天方夜谭。提到合演《四五花洞》，不能不提梅、尚、程、荀四大名旦同灌《四五花洞》唱片的过程。说是一张唱片，其中四大名旦每人只有一句唱，许多人对他们四个人谁唱哪一句的争端，言之凿凿，仿佛真是一件大事似的，但荀慧生的日记对此并未特别交代，只是轻描淡写几笔带过。而杜家祠堂表演《四五花洞》时拍了电影这件日记